

中国古典诗歌
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

肖瑞峰◎著



钱江学术文丛

中国古典诗歌 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 / 肖瑞峰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308-09337-8

I. ①中… II. ①肖…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
中国 IV. ①I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41683 号

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研究

肖瑞峰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03 千字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337-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内容提要

本书试图通过对日本汉诗的总体检阅,系统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衍生与流变,在更浩瀚的学术时空中观照中国古典诗歌的深远影响。全书不仅以宏通的视野考察了覆盖东亚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文化东渐的渠道与方式,探讨了中国古典诗歌得以衍生于东瀛的历史原因,而且细致入微地辨析了日本汉诗的发展阶段及其阶段性特征,清晰地勾勒出其盛衰起伏、递嬗演变的轨迹。此外,本书还在较深的层面上透视了日本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渊源关系,并进而揭示了时代风会、生活环境、审美情趣、民族心理、文化传统等因素在诗歌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多元综合作用。

本书由以下内容构成：

绪论 从域内走向海外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历史使命

本章通过对既往的文学史研究的审视与反思，提出：文学史研究在由微观走向宏观、单一走向多元后，有必要从域内走向海外。

作者认为：文学史研究应当时空合一、纵横交错——“纵”能思贯古今，勾勒出文学兴衰因革的轨迹；“横”能视通中外，映现出文学源流正变的脉络。这就必须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将视野拓展到曾经覆盖东亚地区的汉字文化圈，将衍生于演变于其中的海外汉文学，尤其是蔚然可观的海外汉诗视为中国文学的重要分支，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范畴。

作者指出：只有努力开拓海外汉文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才有可能扩大既有的研究半径，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对中国文学、包括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总体把握和全面观照。同时，随着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对产生于华夏本土的中国古典诗歌的认知将可的到进一步的深化。这就是说，研究海外汉诗，不仅可以张大文学史研究的广度，而且可以拓进文学史研究的深度。

作者强调：当我们的研究视野从域内拓展到海外后，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最佳衍生地，东瀛自然率先成为我们考察

与探讨的对象。探讨东瀛汉诗形成与发展的原因,考察东瀛汉诗盛衰起伏、递嬗演变的轨迹,并进而剖析东瀛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渊源关系,对于推动整个海外汉文学研究,无疑具有示范和典型意义。当我们刚刚涉足海外汉诗这一新的研究畛域时,将探求的目光暂时锁定于东瀛亦即日本,应当是明智的选择。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东渐与 日本汉诗的发轫

本章以“中国文化东渐的时空隧道与日本汉诗的生成”、“中国文化东渐的多元形态与日本汉诗的发展”、“中国文化制导下的东瀛文化政策与日本汉诗的推进”为目,考察了中国文化与东瀛汉诗的“双边关系”,评述了前者对后者的制约与影响。

作者认为:日本汉诗的形成,是中国文化东渐的结果;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东渐,汉诗才得以在扶桑之国落地生根和扬芳吐蕊。不仅如此,日本汉诗形成以后,也始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中国文化的制约与影响。可以说,日本汉诗之所以能在蜿蜒中发展、迂回中演进,赢得与和歌平分秋色的局面,并一度占据文坛的统治地位,是以中日两国之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为必要条件的。

作者还指出:日本汉诗的形成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

历代天皇制定的文化政策以及他们对汉诗创作的崇尚与奖掖，而由这些文化政策、这种崇尚与奖掖，同样可以观照不断东渐的中国文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第二章 东瀛汉诗的历史流程及嬗变轨迹

本章采用“散点透视”的方式，通过对产生于四个不同时期的日本汉诗总集（即《怀风藻》、“敕撰三集”、《本朝丽藻》、《本朝无题诗》）的观照与评说，初步勾勒出东瀛汉诗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

作者认为：正如巡视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不能不首先瞩目于孔子删定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并以它为起点来展开追踪与扫描一样，考察日本汉诗递嬗演变的历史，也不能不首先聚焦于日本最早的汉诗总集《怀风藻》，并以之作为观照与探索的起点。《怀风藻》在编次方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但侍宴应制之作的连篇累牍，却表明当时的汉诗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娱情遣兴的需要。相形之下，模山范水之作似乎乏善可陈。至于其艺术形式，则带有汉诗发轫期的不可避免的稚拙。

作者指出：由奈良朝演变为平安朝，既是历史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也是文学意义上的时移世迁。将主要反映平安朝初期的汉诗风貌的“敕撰三集”与主要反映奈良朝汉诗风貌的《怀风藻》相比较，那就可以看到：伴随着思想内容方面向“深度”与“广度”

的拓展,“敕撰三集”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提高了其“精度”与“密度”。因此,“敕撰三集”恰好可以成为我们观照日本汉诗艺术演进的一个视窗。就“诗体”而言,演进与提高的标志至少有以下数端:其一,七言诗的数量较前大为增加;其二,在七言诗中七言绝句又占较大比重;其三,长篇古诗亦较前增多;其四,新添杂言一体;其五,出现了长短句的词。

作者还指出:产生于一条天皇御宇期间的汉诗总集《本朝丽藻》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尽管以学习白居易相标榜,创作取向却与早年的白居易迥异其趣。伴随着对政治、对现实的淡漠,《丽藻》的作者比他们的前辈更加热衷于“嘲风雪,弄花草”,更加兴趣盎然地在“花间”、“尊前”倾泻其才情。与这一创作倾向相适应,《丽藻》的作者所致力表现的诗题往往不是采撷自现实生活,而是撷拾自前人佳作。于是,所谓“句题诗”便盛极一时。此外,探韵、次韵这一游戏之风也愈演愈烈。凡此种种,既是创造精神枯竭的表现,也是主体意识薄弱的表现。

作者强调:在平安朝后期问世的汉诗总集中,《本朝无题诗》最为引人注目。一方面,它仍不免带有平安朝汉诗所共有的贵族化特征;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一定的平民化倾向,或者说在局部范围内表现出由贵族化向平民化演变的努力。而这,对于时代潮流显然是一种未必自觉的反动。

第三章 东瀛汉诗对中国古典 诗歌的模拟与师法

本章由“作家篇”和“地域”篇两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展示、评析了东瀛汉诗模拟与师法中国古典诗歌的形态及其得失。

“作家篇”缕述了日本平安朝诗人奉白居易为偶像、奉白居易诗为楷模的一系列实例,并从中寻绎出其不同寻常的意义。

作者指出:在平安朝时期,白居易及《白氏文集》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东瀛诗人们模仿白诗的角度是千差万别的——有效其诗之风格者,有袭其诗之辞句者,有蹈其诗之意旨者,有摹其诗之情境者,也有鉴其诗之章法技巧者。具体例证不仅充彻于菅原道真等诗坛名家的别集,而且在一些知名度不高的诗人诗作中也俯拾皆是。

作者认为:《白氏文集》盛行于平安朝时期,并被缙绅诗人们作为主要模仿对象,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至于东瀛诗人对白居易及《白氏文集》的学习、模仿,则是既有“得”,又有“失”——其“失”主要有二:一是不适当地将白居易神化,以致歪曲了白氏的真实形象,丢弃了白诗的批判精神;二是白诗原有“好尽之累”,平安朝诗人以白诗为规摹,难免在不失体裁的同时,产生言繁语冗之弊。

“地域篇”评述了东瀛诗人对“浙东唐诗之路”的向往以及东瀛汉诗对“浙东唐诗之路”的表现,并进而揭示了与此相关的东瀛诗坛的风会变迁。

作者指出:“浙东唐诗之路”既牵系着平安朝诗人的情思,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题材领域和意象仓廩。但在遣唐使频繁赴唐的奈良朝的汉诗作品中,几乎没有一篇涉及“浙东唐诗之路”,与此相反,在遣唐使制度废止后的平安朝中后期,咏及“浙东唐诗之路”的篇章却稍觅即得。个中原因在于:由于中国古典诗歌“代有新变”,所以日本汉诗模拟与师法的对象也就不断发生转移——由六朝诗转移到唐诗,再由唐诗转移到宋诗。这种转移的过程,亦即诗坛风会变迁的过程。但日本诗坛的风归变迁,不是与中国诗坛同步进行的,而要落后于中国诗坛半世纪或一世纪。在奈良朝时期,为缙绅诗人们所模拟并影响着诗坛风会的恰恰是六朝诗而非唐诗。既然直至平安朝时期,诗坛风会才由模拟六朝诗转变为模拟唐诗,奈良朝的汉诗作品无一咏及“浙东唐诗之路”也就可以理解了。

作者还指出:唐代诗人并非仅仅以“浙东唐诗之路”为活动半径,而有着更为广阔的漫游天地。既然如此,为什么平安朝诗人对唐代其他地区的风景名胜难得涉笔,而唯独钟情于“浙东唐诗之路”呢?这与“浙东唐诗之路”发端于天台,而天台又是平安朝诗人渴望朝拜的佛教圣地有关。

第四章 东瀛汉诗对中国古典 诗歌的变革与改造

本章由“作家篇”和“流别篇”两部分组成,从不同角度考察、评议了东瀛诗人变革与改造中国古典诗歌的情形及其得失。

“作家篇”聚焦于平安朝诗坛之冠冕菅原道真,指出:在中国古典诗歌衍生与演进于东瀛的历史过程中,菅原道真是至为关键的人物——在以无与伦比的热情对中国古典诗歌进行模拟与师法的同时,他还尝试着中国古典诗歌进行了某些变革与改造,虽然后者往往是不成功的。

作者认为:菅原道真一生的汉诗创作,经历了占尽“诗臣”风流的仕宦显达时期,初现“诗人”本色的谪守赞岐时期,游移于“诗臣”与“诗人”之间的重返台阁时期,以及“诗人”角色最终定位的贬居太宰时期。唯其如此,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在东瀛的天才“传人”,他的创作生活似乎比中国本土的古典诗人更显得丰富多彩。

作者强调:从内容上看,为《菅家文草》和《菅家后草》所收录的 500 余首汉诗作品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可以混同于一般的侍宴应制之作。但这并不是主流。如果撇开这部分仅能体现时代共性而难以反映作者个性的庸常之作,就其中最能代表作者

风貌的精粹之作加以考察,那就不能不肯定它们有着鲜明的思想特色,从而一方面足以区别并超拔于同一时代的其他作家别集,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思想仓廩有所充实与丰富。

作者指出:菅原道真以务欲登峰造极的雄心,对汉诗艺术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力图在孜孜不倦的创作实践中,尽究个中三昧,并用富于创造性的成果,为日本平安朝诗坛树立新的典范。作为诗神缪斯对辛勤的开拓者的酬劳,道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而这些艺术成就的取得,又是与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传统所进行的适当的同时也是有限的变革与改造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几点是:一、强化了汉诗的抒情功能;二、提高了汉诗的造语技巧;三、丰富了汉诗的状态手法;四、改进了汉诗的谋篇工艺。

“流别篇”通过评述江户时期流派纷呈的诗坛盛况,从另一侧面观照了东瀛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

作者认为:如果说直至五山时代,东瀛汉诗仍未能完全脱离模拟与仿效状态的话,那么,进入江户时代后,尽管模拟与仿效之风犹存,诗人们所更多地致力的却是变革与改造了。

作者指出:江户时代,是东瀛汉诗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正如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代才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一样,日本汉诗发展到江户时代,才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全盛的标志不仅在于作品数量的浩大,更在于流派的众多、风格的繁富、体制的完备、技巧的成熟。经过多少代的积累与传承,于此时期崭露头角的一大批优秀诗人既怀有问鼎诗坛的雄心,也具备了创

作出成熟、精美的汉诗所必需的艺术修养。他们已不满足于像他们的前辈诗人那样重复中国诗人所表现过的内容,而力图用汉诗这一外来的文学样式刻画本民族特有的风物,展现本民族特有的风俗,抒写本民族特有的风情。广濂淡窗的《黄叶夕阳村舍诗》、寺门静轩的《江头百咏》、菊池五山的《水东竹枝词》、匹田松塘的《长堤竹枝词》、赖山阳的《长崎谣》、梁川星岩的《琼浦杂咏》、中岛棕隐的《鸭东四时杂词》等等即属其例。

作者还指出:日本著名学者川口久雄在《平安朝日本汉文学史的研究》一书中曾特别论述平安朝中后期汉诗的和样化倾向。但和样化真正作为一种倾向,实际上是直到江户时代才出现的;而且,江户诗人对和样化的归依,是与对多样化的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在江户时代,和样化与多样化这两种倾向是相互交融的。而这正体现了江户诗人试图对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进行变革与改造的不懈努力

目 录

内容提要	(1)
------------	-----

绪 论 从域内走向海外——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历史使命	(1)
一、缘起：对既往的文学史研究的审视与反思	(1)
二、理由：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走向海外的多重意义 ...	(8)
三、对象：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最佳衍生地——东瀛 ...	(14)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东渐与日本汉诗的发轫	(34)
一、中国文化东渐的时空隧道与日本汉诗的生成 ...	(34)
二、中国文化东渐的多元形态与日本汉诗的发展 ...	(45)
三、中国文化制导下的东瀛文化政策与日本汉诗的推进	(52)

第二章 东瀛汉诗的历史流程及嬗变轨迹	(73)
一、《怀风藻》:日本汉诗发轫的标志	(73)
二、从“敕撰三集”看东瀛汉诗艺术的演进	(96)
三、《本朝丽藻》的时代色彩	(113)
四、《本朝无题诗》:贵族化特征与平民化倾向	(132)
第三章 东瀛汉诗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模拟与师法	(149)
一、作家篇:白居易与日本汉诗	(149)
二、地域篇:浙东唐诗之路与日本汉诗	(166)
第四章 东瀛汉诗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变革与改造	(188)
一、作家篇:菅原道真与中国古典诗歌	(188)
二、流别篇:江户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	(252)
主要参考文献	(279)
后 记	(287)

绪论 从域内走向海外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历史使命

一、缘起：对既往的文学史研究的审视与反思

没有谁能无视或否认近年来文学史研究的突飞猛进：原先罕见有人道及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学，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火爆”到街谈巷议的地步，却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津津乐道，并且时有一新天下人耳目的精到之论见诸报刊。这犹为次，更重要的是，数十部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新体系的断代或分体文学史已翩然问世，从而表明文学史观的阐扬和文学史学的建构，已脱离了纯学术探讨的形态，而生动地体现在卓有成效的编写实践中。就中，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

社 1997 年第一版)与袁行霈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一版)分别因视角独特、新见迭出和体系严密、胜义纷呈而代表了当今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准,备承学界赞誉。尽管人们从十多年前便开始千呼万唤的“大文学史”迄今尚不见分娩的迹象,以至很难断言它已指日可待,但完全可以说,它不仅早已进入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孕育过程,而且已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其胎动。唯其如此,当我们审视文学史研究的现状时,有理由感到欣慰。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又抑制不住向学界叩问的冲动:文学史研究在由微观走向宏观、单一走向多元以后,是否还有必要从域内走向海外呢?

随着长期封闭的国门的“訇然中开”,我们在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与世界经济、文化接轨的时代使命的同时,不能不痛苦地反思以往闭关自守的文化政策所带来的后果,那便是既有效地遏止了海外文化向中国的渗透,也有力地钳制了中国文化向海外的传播。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当然有必要全方位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域内和海外之间编织起一条联系的纽带。而从历史渊源看,文学史研究完全有条件“导夫先路”。

无须讳言,时至今日,人们对“大文学史”的期待依然如故。在我看来,所谓“大文学史”绝不仅仅意味着卷帙的浩繁和论述的详密。它除了应当兼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独特的学术构想和独到的学术视野外,还应当具备涵盖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全新体系。这就必须从纵横两方面加以拓展——